

謝明良
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壺

一、外觀特徵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品當中，包括一件鐫刻有乾隆御製詩的陶壺。陶壺於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在南京開箱點檢時已殘破，造型呈敞口、喇叭



圖一 a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式頸，口徑約二十二公分，肩以下部位已殘，但經由破片可大致翻合出壺的最大徑約在器中腹，以下弧度內收成圓底（圖一 a、b、c）。壺肩腹滿飾印紋，即以正反三角和短直線紋為單位的長方形模具，於



圖一 b

頸肩處拍捺紋飾。由於各模印單位之紋飾上下位置均整，因此在外觀上有如數組水平方向的由弦紋和三角形紋所構成的連續紋飾。壺肩以下腹部同樣是以拍印的方式捺印出魚骨狀的杉木紋飾，以下至圓底則是



圖一 c

壓印由短直線為中軸，兩側飾梳紋般斜直線的幾何形連續紋飾（圖一 d）。

從破片斷面可以看出器胎呈片層狀，胎色灰白，質地粗鬆並夾雜有石英細小顆粒。口頸較厚，肩部至腹部、圓底漸次趨薄。由於是以泥條盤築成形，同時以模具拍實，故相對於壺外側的幾何形印紋，壺腹內壁則留下清晰的指頭印痕跡。器表呈色較黑，推測有可能是燒成時因煙燻所導致，但也不排除曾於器表施抹一層薄



圖一 d

黑泥料再以低溫燒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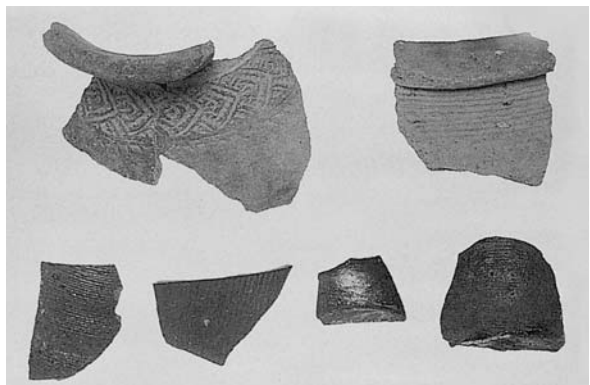
壺口內壁鏤削粗弦紋一周，弦紋下方鐫刻乾隆御製詩：「質樸形猶古，神農編作遺，陶成火氣泯，器合道心怡，遠矣無當誠，何妨有用時，誰加雕鏤細，破此太初姿」，詩後並有「乾隆丁巳御題」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紀年，以及「幾瑕閒情」和「得佳趣」等兩方閒章（圖一 e）。該一詩文亦收入於乾隆《御製詩文集餘集》卷十三，詩題為《詠古陶器》（註一）。



圖一 e

值得留意的是，詩文集中保留有乾隆的詩注，即乾隆在該詩「誰加雕鏤細」句後自注曰：「此器制度渾樸，自不應有花紋，想係後人復加雕刻者，但所雕文理不俗，無斧蹟痕，與器同色，撫不留手，亦即三代以上所作物耳」。從而可知，乾隆依據陶壺形制樸拙這一特點，判斷作品應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即今日所謂新石器時代遺物。其次，乾隆雖一度懷疑是這樣古老陶器上所見紋飾，可能是後人加工而成？然而，卻又因觀察到紋飾無突兀造作之感，特別是紋飾外觀呈色與陶壺其他部位一致，用手撫之也頗為平滑，因此改變初衷，認為陶壺上的紋飾為原雕，而非後世所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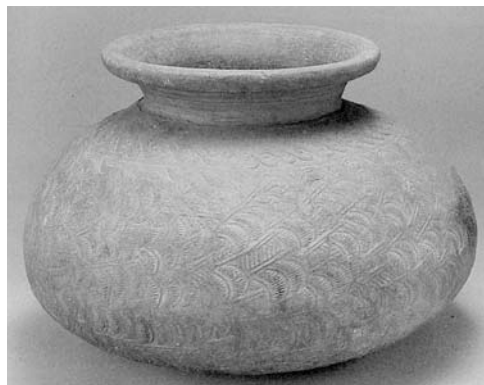
雖然，我們從傳世的百餘首乾隆詠瓷詩中可以輕易掌握乾隆鑑定古代陶瓷的方法，其鑑別觀看角度包括了作品的釉光、瓷釉開片紋理、支釘痕跡、胎質、器形、成形技法等，但涉及「皮殼」，即觀察刻紋外觀呈色、質感是否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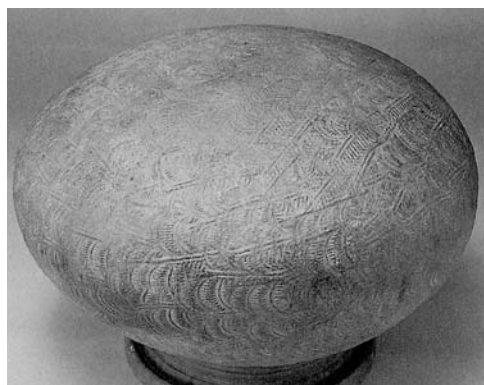
圖五 日本長崎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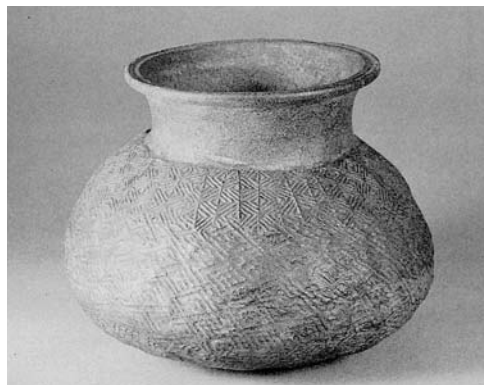
圖四 日本町田市美術館藏



圖二a 日本福岡市美術館藏，高34.2公分，
口徑29.5公分



圖二b 日本福岡市美術館藏，高34.2公分，
口徑29.5公分



圖三 日本町田市美術館藏，高16公分

品其他部位相符者，僅此一例，而此一觀看角度至今仍有其現實上的意義。這就像是我們可以從鐫刻於陶壺內口沿部位的乾隆御製詩文字跡顏色較淡，與陶壺其他部位的外觀呈色不同，而判斷文字是陶壺燒成之後所加刻。

二、產地

儘管中國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不乏裝飾有各種幾何形印紋的陶器，但均和本文所欲考察的清宮傳世乾隆刻銘陶壺有較大的區別。相對的，散見於世

界各地公私收藏中的一類東南亞印紋陶器，則無論在造型、紋飾、成形技法乃至於胎土等各方面特徵則和前引乾隆刻銘陶壺極為一致，無疑是來自相同或相近地區所生產。目前所見這類東南亞燒製的印紋陶器之尺寸大小、造型、紋飾不盡相同，大型者通高三十餘公分，口徑近三十公分（圖二）（註二）；小型者通高約十多公分（圖三）（註三）。印紋裝飾內容既豐富，壺造型外觀、呈色也不一而足，有呈淺黃色的，也有的呈深褐色，少

數作品還見有弦紋紅色彩繪裝飾等。但整體而言，其造型大致可區分成長頸和短頸等兩大類型。台灣故宮乾隆刻銘陶壺屬長頸類型，從殘片之復原圖合，估計器形和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的藏品較為接近（圖四）。後者口徑也和故宮藏品相近約二十一公分，通高二十六公分，最大腹徑三十三公分。（註四）以往學界對於該類陶壺的產地，雖曾推測是來自菲律賓或緬甸、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某一地區所生產（註五），不過自七十年代

Spinks指出其產地是在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dhya），即《清史·暹羅傳》之「阿由提亞」，也就是華僑所謂「大城」以來（註六），近年泰國學者也證實了阿瑜陀耶近郊帕尼亞（Panai）即為產地之一。（註七）其次，阿瑜陀耶（大城）北郊亦曾發現燒造這類印紋陶壺的窯址（註八）。如前所述，傳世的該類陶壺之造型、紋飾不一，說明其可能來自複雜窯場所生產。但就目前已確認的資料看來，其產地集中於泰國中部阿瑜陀耶及其鄰近地區。換言之，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之鐫刻有乾隆（詠古陶器）詩文的印紋陶壺是來自暹羅即今日泰國的製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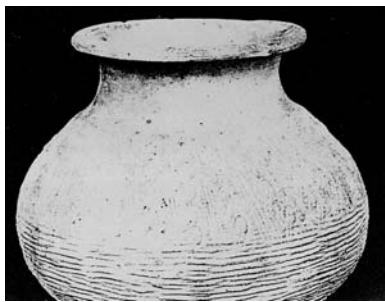
三、年代

有關泰國阿瑜陀耶及其鄰近地區所燒製印紋陶器之年代釐測，目前學界主要是參照（一）陸地考古遺址，以及（二）水下沉船所出同類標本來訂定的。經正式考古發掘並有報告書公布於世的陸地遺址

集中於日本，沉船則大多分布於東南亞海域。

出土有這類印紋陶器的日本考古遺址至少包括沖繩（首里城京之內、今歸仁城、我謝）、福岡（博多）、長崎市（萬才町、榮町、興善町）、福井縣（一乘谷）等諸遺跡（圖五）。其中，沖繩首里城京之內倉庫遺跡推測因毀於一四五九年的一次火災，故伴出標本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五世紀前半期（註九）。其次，福井縣一乘谷朝倉氏遺跡標本也是出土於一五七五年火災層位堆積，故其年代約在十六世紀中期（註十）。此外，長崎市萬才町、榮町、興善町所出標本，則可從遺跡層位、性質和伴出遺物推測其相對年代約於十六至十七世紀（註十一）。因此，就日本遺跡所見阿瑜陀耶印紋陶器的年代而言，是存在於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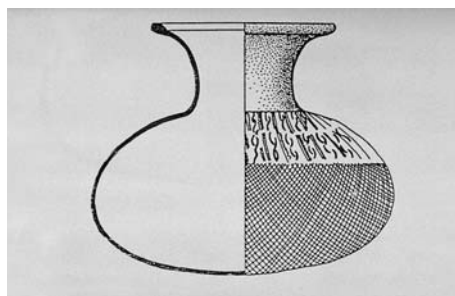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就我所能掌握的伴出有這類陶器的沈船計有：泰國海域打撈上岸的所謂 Koh Khram wreck、Patta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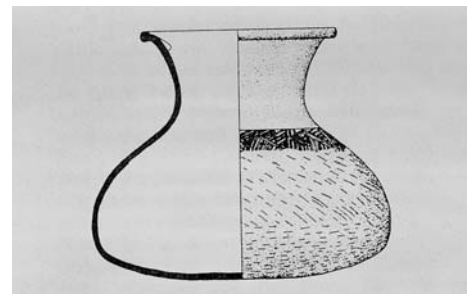
圖一一 泰國Koh Khram沈船打撈



圖一〇 日本博多遺跡出土



圖七 泰國Ko Si Chang III 沈船打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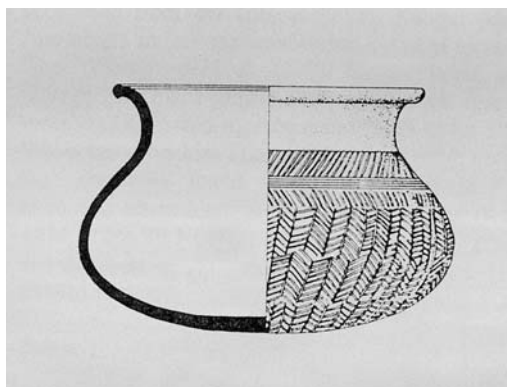


圖六 泰國Ko Si Chang I 沈船打撈

儘管臺灣故宮所藏乾隆刻銘印紋陶壺的印紋裝飾極具特色，可惜我未能在可判明大致年代的考古遺址中尋覓出同樣的標本。不過，由於該印紋壺仍可大致闢合復原，因此首先可經由造型之比對而間接地推定其相對年代。

就我所掌握的資料而言，與故宮乾隆刻銘陶壺造型

M370) (圖一〇)，以往有五世紀前半(註十七)、十五世紀中期至末期(註十八)、十六世紀前半(註十九)以及十五至十六世紀等多種不同的看法(註二十)。由於博多遺址標本之造型和印紋特徵均和前引泰國十五世紀Ko Khram wreck所見同類作品類似(圖一一)(註二一)，故沈船資料可提供檢視同類標本年代的線索。至於和本文密切相關的後項議題，在尚未能掌握阿瑜陀耶印紋陶器風格變遷之前，我們只能匠氣地尋求和傳世遺物造型或裝飾類似的考古標本，以為傳世作品年代的判斷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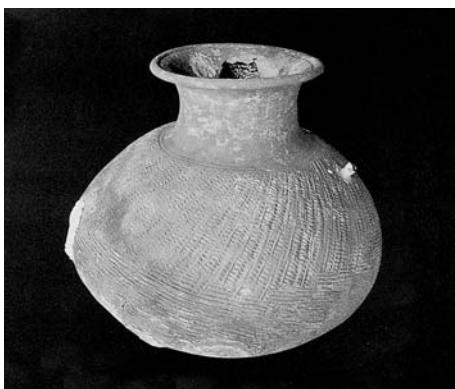
圖一二 泰國Ko Si Chang I 沈船

相近，呈喇叭式長頸、扁圓腹、圓底器式的作品，分別見於泰國Ko Si Chang I、III和Pataya wreck，(註二二)以及印尼海域打撈上岸的Bakau wreck和近年於馬來西亞所打撈的沈船。(註二三)。如前所述，Ko Si Chang I的相對年代可以確定是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該沈船既發現有和故宮乾隆銘陶壺器式相近的作品(同圖六)，伴出的另一件廣口短頸壺腹所見形似魚骨印紋(圖一一)也和故宮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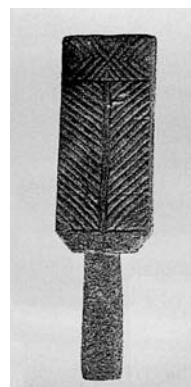
圖一三 印尼Bakau沈船打撈

有類似之處(同圖一)。(註二四)其次，Ko Si Chang III也見有該式長頸壺，儘管Ko Si Chang III之碳十四測定值為1410±70，年代跨幅較大，不過，由於伴出的一式泰國褐釉四繫罐和日本沖繩首里城京之內遺跡所見相近，而後者遺跡推測是毀於一四五九年火災，故可推測Ko Si Chang III的相對年代也約於十五世紀中期。另外，印尼蘇門答臘(Sumatara)東南海域勿里洞島(Belitung)發現的Bakau



圖八 馬來西亞沈船打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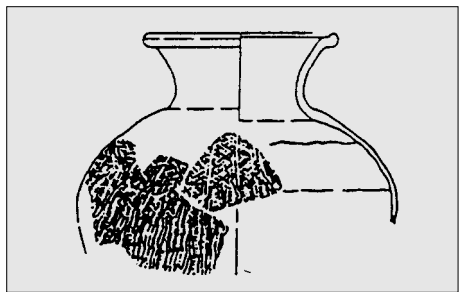
wreck以及Ko Si Chang地區編號I、II、III等三處沈船遺留(圖六、七)。此外，印尼發現的Bakau wreck或近年公布的馬來西亞海域沈船也可見到該類陶器作品(圖八)。上述沈船當中，Ko Si Chang I因伴出有中國景德鎮生產之帶有「大明萬曆年製」(一五七三—一六一五)青花瓷器，可知其年代是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註十二)；而若依據碳十四年代測定，則Ko Si Chang III年代約為1410±70，Ko Khram wreck則為1520±140和



圖九 泰國土著所使用的拍具

1680±270。(註十三)後者Ko Khram wreck也已由Roxanna M. Brown參酌其他東南亞陶瓷資料，指出其應屬十五世紀沈船。(註十四)這樣看來，陸上考古遺址和水下沈船資料都顯示泰國阿瑜陀耶印紋陶器的年代集中於十五至十七世紀。當然，此一年代幅的意義主要是顯示泰國以外地區的使用、流通之一端，絕非意謂著該類印紋陶器生產的上下限，因為一直到近代，泰國土著仍然持續燒造類似的印紋陶器，我們從當代學者的田野調查文獻當中甚至可以發現其使用的拍捺模具上的幾何紋飾(圖九)(註十五)，竟和本文所討論的乾隆刻銘陶壺壺下腹紋飾(圖一d)幾乎完全一致。過去，森村健一曾

依據日本出土標本並參酌部分沈船資料，數度撰文針對這類印紋陶器進行了編年和分期而為學界所屢次引用，可惜所引沈船資料既有所遺漏，同時又張冠李戴地錯置作品出自，以致於出現了將伴出有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五)年款青花瓷的Ko Si Chang I之印紋陶納入同氏所謂的二期(一四五〇—一五〇〇)，並且錯誤地將同樣是來自Ko Si Chang III的作品分別歸入I、II(一五〇〇—一五五〇)以及IV(一六〇〇—)等各個期別(註十六)。雖然，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得以將傳世的可能來自阿瑜陀耶及其鄰近地區複雜窯場所生產的該類印紋陶器予以編年或風格分期，但是我們既可經由陸地遺址和沈船所見類似作風的標本來交叉檢驗作品的可能時代，也可依據遺址出土之可大致判明年代的作品，逕與傳世作品進行外觀比對從而掌握後者的相對年代。就前項議題而言，如日本博多第六十次發掘出土品(HKT60，



圖一八 日本福井縣一乘谷遺跡出土

按理說，在初步釐清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鐫刻乾隆〈詠古陶器〉詩文的印紋陶壺是十五至十七世紀泰國陶器的同時，本文有義務針對清宮的

四、小結

和江蘇省南京市中華門外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宋晟墓出土的龍泉窯碗完全一致（圖一六），（註二六）同時Bakau wreck 伴出的泰國褐釉四繫罐也和前述暹羅灣Ko Si Chang III 沈船遺留（註二七），以及燒毀於一四五〇年代之沖繩首里遺跡所出作品相近（圖一七）。（註二八）這樣看來，Bakau wreck的相對年代很可能確如Michael Flecker所推測的是在十五世紀早期。借由以上沈船資料的比對，雖然顯示臺灣故宮乾隆刻銘泰國陶壺與十七世紀作品相對地近似，但由於十五世紀作品亦存在類似作例，在此我保守地估計故宮藏品的年代約在十五至十七世紀之間。

入藏途徑，即乾隆如何獲得此一陶壺略作交待。然而，有關此方面的訊息卻難以正確地掌握。這是因為儘管明人著作如黃省曾《西洋朝貢錄》、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張燮《東西洋考》等均設「暹羅」一節記述其國風土、物產和朝貢等事，特別是明代官修《實錄》更是網羅了自明太祖洪武四年（一二七一）以迄熹宗天啓三年（一六二二）暹羅遣使向明朝朝貢等泰中交往等史事，然而或許是因明代陶瓷產業發達，馳名海外，因此不但見不到由暹羅進貢的物品中有陶瓷器，反倒是記錄了洪武帝曾遣使賜暹羅國陶瓷。（註二九）另一方面，由於暹羅國貢明的物品當中既然包括不少需要器皿裝盛的寶石和珍奇香料等物品，因此不能排除這件乾隆刻銘陶壺原來是內裝某種土產，於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某次赴中的暹羅使節攜來而後傳至清宮。由於清康熙三年至雍正十年暹羅與清國也有九次的正式往來（註三十），因此我們也

可設想其有可能是此一期間暹羅入貢或地方官經由某種途徑獲得後再獻呈清廷。無論如何，由於以上推測均無法檢證其真偽，嚴格說來並無太大的意義。但可確認的是，陶壺上之御製詩的紀年表明其最遲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已經入藏清宮。其次，我們從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千字文編號，即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點檢號可以追溯得知該暹羅陶壺原是清宮養心殿皮藏文物。

相對於泰國當地是以該類陶壺做為內盛椰樹汁煮製砂糖的砂糖壺（sugar pot），或用以貯水、煮食的實用器（註三一），乾隆則是將其視為中國古陶予以珍藏。另一方面，日本遺址也出土不少這類標本，其中又以著名的一乘谷遺跡陶片最值得留意（圖一八）。一乘谷是戰國大名朝倉孝景於文明初年（一四六九）在越前建立的京都，後毀於天正元年（一五七三）織田信長的征戰。在該遺址出土的此類印紋陶壺殘片當中包括有於內壁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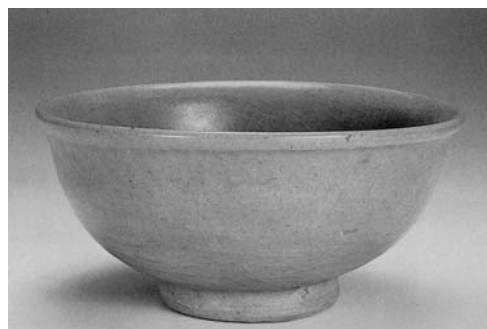
圖一五 印尼Bakau沈船打撈



圖一四 印尼Bakau沈船打撈



圖一七 印尼Bakau沈船打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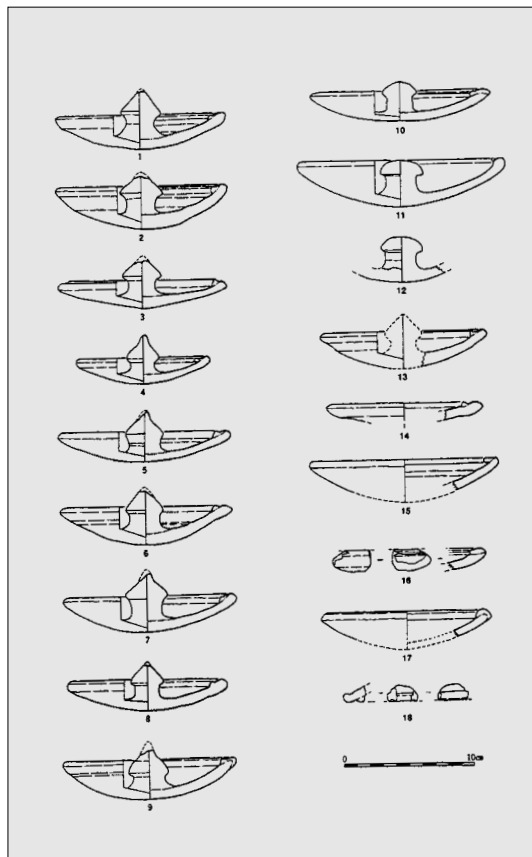


圖一六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永樂五年（1407年）宋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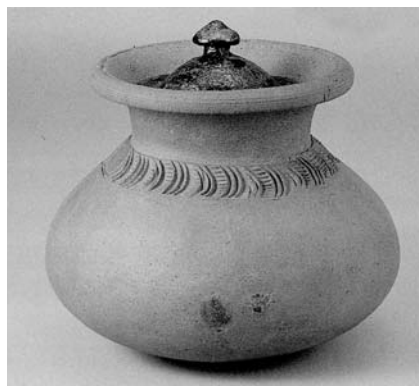
wreck也存在不少類似造型的印紋陶器（圖一二、一四）。Bakau wreck雖由Michael Flecker指出係來自中國的十五世紀早期商船，但是相對於同氏是以破十四測定值和「永樂通寶」銅錢做為沈船年代的判斷依據，（註二五）我因有幸親自觀察沈船所出絕大多數遺物，故想補充指出Bakau wreck所見一式口沿略往外卷的龍泉青瓷碗（圖一五），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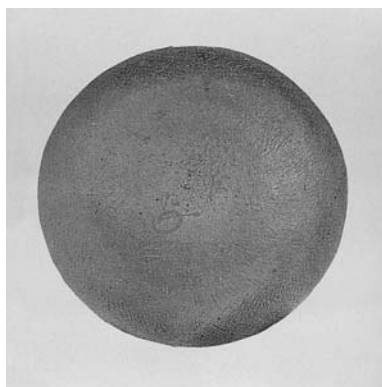
圖二二 移動式陶灶和陶釜



圖二一 日本沖繩縣首里京之内遺跡出土



圖一九 日本傳世茶道水指



圖二〇b 日本三谷宗鎮（1665-1741年）傳世品



圖二〇a 日本三谷宗鎮（1665-1741年）傳世品

漆以防止水滲漏，被做為茶道具使用之例。（註三二）如前所述，這類泰國印紋陶壺尺寸大小不一，器形較大者被日本轉用於茶道席中裝盛洗濯茶碗、茶筴或補給茶釜用水的所謂水指；器式較小者被利用於洗濯茶碗廢水的所謂建水或水翻。前者水指如傳世的一件於壺頸飾印紋的作品（圖一九），該壺配置有日本樂燒一入（一六四〇—一六九六）所做的器蓋，同時貯藏的木箱亦有「袋形 南蠻物」墨書。（註三三）袋形是指壺、罐等容量較大的器物，南蠻物則是

其時日本對暹羅、呂宋、爪哇和南洋群島土產或經由上述地區輾轉傳入日本之西歐物品的泛稱。至於建水之使用例，則見於三谷宗鎮（一六六五—一七四一）傳世器（圖二〇），

該陶壺壺口沿有三處支燒痕，壺底以朱漆書「老の友」銘文和花押，木箱蓋則墨書「ハンネラ水翻」，是流傳有緒的著名茶道具（註三四）。所謂「ハンネラ」即「半練」是當今日本茶道界對於東南亞這類陶器的泛稱。其語源出自不明，但從文化八年（一八一）松平不昧（一七五—一八一八）之《雲州藏帳》（《不昧公遺物帳》）已經記載「はんねら」水指（註三五），或可推測至遲在江戶時期日本茶人已經能大致掌握該類陶器的可能產地。就此而言，乾隆將前述這件鐫刻有其本人詩文的暹羅印紋陶壺誤判為中國古代陶器，正透露出古瓷學養深厚如乾隆者，難免也因囿於上國心態，從而造成對中國以外的陶器懵然無知？不過，這件泰國陶壺之所以會陳設於雍正以來各帝王居住、召對的養心殿中，恐怕也是拜乾隆鑑定失誤之賜吧！一個有趣的事實是，相對於乾隆對於泰國陶壺的無知，此時的泰國王室卻往往向中國

景德鎮等地訂製具有泰國傳統圖紋的被稱為賓乍隆（Bencharong）的釉上彩瓷器，Bencharong「五」，rong則在意謂「色」，合起來即五彩之意。（註三六）

最後，應予一提的是，前引松平不昧遺物帳中的一件帶蓋「ハンネラ」水指值金三十兩，光是器蓋也值金十枚，但同物帳所記明代嘉靖年製龍鳳紋蓋盒僅值錢二十五兩，（註三七）此說明了日本茶人對於

此類粗製印紋陶壺的喜愛程度並不亞於中國的細瓷。故宮乾隆刻銘陶壺蓋已佚失，不過我們從陸地考古遺址或沈船遺物都可見到這類壺蓋，壺蓋細部造型不一，但蓋面多內凹成圓底，蓋心置寶珠形或覃狀鈕（圖二一）。由於一六一三年沈沒於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亦發現此類陶蓋和印紋陶片（註三八），據此可以推測白獅號沈船原本亦載運有該類陶壺。另外，這類陶壺有時還與攜帶式陶灶成雙配對（圖二二），頗具機動性。（註二九）

註釋：

-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全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卷十四，頁五一—六。
- 二、福岡市美術館，《珠玉の東南アジア美術》（福岡：福岡市美術館，二〇〇〇），圖九七。
- 三、長谷部樂爾，《インドシナ半島の陶磁》，（東京：琉璃書

- 四、町田市美術館，《インドシナ半島の陶磁器》，（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一九九〇）圖二三九。
- 五、滿岡忠成等，〈南海陶磁と日本〉，《世界陶磁全集》十六卷・南海（東京：小學館，一九八四），頁二四九；西田宏子，〈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東洋陶磁》一三三・二四（一九九五），頁一八。
- 六、Spinks, Charles N., *The Ayuddhaya-Period Earthenwares, Some Contemporary Thai Kilns, Their wares and Potting Methods.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4-2 (1976) pp.188-189.
- 七、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タイ陶磁について―アマラ・スリサッチャ氏に聞く〉，《法政》一（一九九一）、頁四九。
- 八、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收入：《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二〇〇一）、頁一〇二。
- 九、沖縄縣教育委員会，〈首里城跡―京の内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沖縄縣文化財調査報告集第一三三集（一九九八）頁二五五―二五六。另外，龜井明德認為沖縄發現的此類泰國印紋陶的年代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前半，參見同氏，〈琉球陶磁貿易の構造的理解〉《專修人文論集》六十（一九九七），頁六一。
- 十、有島美江，〈博多出土のタイ・ストナム陶磁〉，《貿易陶磁研究》十一（一九九一）、頁一一八。
- 十一、森村健一，〈日本における遺跡出土のタイ陶磁器〉，《東洋陶磁》一三三・二四（一九九五）、頁七五。
- 十二、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Ko Si 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1985, A Progress repor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5-2(1986), p.105.
- 十三、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Maritime Archaeology of Shipwrecks and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4 pp.18, 57.
- 十四、Roxanna M. Brown,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New York (1988), p1.47-c.
- 十五、Wilhelm G. Sothelm II, *Pottery Manufacture in Sting Mor and Ban Nong Sua Kin Ma,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52-2(1964), p1.1a. 另外，東南亞土著陶器概要可參見：今村啓爾，〈東南アジアの土器〉，《世界陶磁全集》十六・南海（東京：小學館，一九九四）、頁一五四―一七二。
- 十六、森村健一，同註十一頁七七圖九以及同氏，〈十五十七世紀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からみた陶磁の日本文化―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遺物を中心とし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九四集（二〇〇一）、頁一七二圖二。
- 十七、森村健一，同註十一頁七五。
- 十八、大庭康時，〈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産陶磁器〉，《考古學ジャーナル》四四八（一九九九）、頁一八。
- 十九、有島美江，同註十一，頁一
- 一三二。
- 二十、伊藤嘉博，〈日本出土の東南アジア磁器〉，收入《日本出土の船載陶磁―朝鮮、渤海・ストナム・タイ・イスラム―》，（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二〇〇〇）頁八五圖一五八。
- 二一、Roxanna M. Brown，同註十四・p1.47-c.
- 二二、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 Australi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1, 1983. p.13.
- 二三、Roxanna M. Brown and Sten Sjoststr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 Department of Museum and Antiquities,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3, p1.25.
- 二四、Jeremy Green, Rosemary Haber and Vidya Intakosi, *The Ko Si Chang Shipwreck Excavation*, Australi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 No.4, 1987, 報告集第一三三集（一九九八）頁二五五―二五六。另外，龜井明德認為沖縄發現的此類泰國印紋陶的年代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前半，參見同氏，〈琉球陶磁貿易の構造的理解〉《專修人文論集》六十（一九九七），頁六一。
- 二五、Michael Flecker, *The Bakau wreck: and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0.2(2001), p.228.
- 二六、朱伯謙，〈龍泉窯青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一七五圖一六一。
- 二七、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Vidya Intakosi 同註二四，頁一三三，圖一六〇。
- 二八、沖縄縣教育委員会，同註九，頁二五圖一八。
- 二九，《明太祖實錄》卷一五六（洪武十六年八月乙未）「遣官賜占城、暹羅、真臘國王織金文綺各三十二匹，磁器一萬九千事」。此轉引自：《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社：武漢出版社，一九九一）、頁八三。
- 三十、李光濤，〈明清兩代與暹羅〉，收入：凌純聲等《中泰文化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一九五八）、頁五八。
- 三一、有島美江，同註十，頁一八。
- 三二、森本朝子，同註七，頁四九。另外，吉良文男提到泰國當地是以大者炊飯，小者盛湯。參見：吉良，同註八，圖版九八的解說。
- 三三、茶道資料館，《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二〇〇一）、頁一八一圖九。
- 三四、根津美術館，《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京都：根津美術館，一九九三）、頁二三圖一七。
- 三五、滿岡忠成，《雲州名物》，收入：《茶道古典全集》十一卷（京都：淡交社，一九七二版），頁二九八。
- 三六、Bhujong Chandavij, (井垣春雄譯)，〈タイの陶磁〉，《世界陶磁全集》十六（東京：小學館，一九八四）、頁一九五。
- 三七、滿岡忠成等，同上註，頁三九五，三九七。
- 三八、G. C. Vander p1j1-ke1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 Museum*.1982), p.253
- 三九、Spinks, Charles N. 同註六・p1.8.